



BAOZH1 BIANJIBU NEI DE
HUAYU GUANLI

报纸编辑部内的 话语管理

刘旻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G213

P1

20132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并出证(鄂)字10号

本书为华中师范大学“丹桂计划”项目

“中国报纸新闻生产研究”成果(项目号:120002040308)

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刘 旻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刘旻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622-5738-7

I. ①报… II. ①刘… III. ①报纸编辑—管理 IV. ①G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5801 号

报纸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

©刘 旻 著

责任编辑:何国梅 王文琴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第二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2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165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0.75

版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3.8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言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置身其中的大众传媒,不仅无法遗世独立于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之外,其本身也正日益成为一个名利场——各种意识形态、利益汇流与斗争的场域。

大众传媒自身也很清醒——媒介与“话语权”之间的亲密联系,是它对其他场域拥有吸引力的根源。那么,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传媒是否拥有这种“话语权”?或拥有多大程度上的“话语权”?传媒应当如何“用好”这一权力?在“用”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这是新闻专业实践一直思索的问题。本书所关注的报纸编辑部内的新闻话语管理,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

当然,传媒话语管理的施动主体很多,除了传媒业自身外,还包括政府行政部门、法律法规等。但是,两相比较,传媒业自身对新闻话语的管理显得更为神秘,远不如后者那么清晰明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受众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新闻“制成品”,而这个“制成品”从原料采集、初步加工直至修整调试的过程,都发生在媒介内部,对于“外人”来说自然难以捉摸。

毋庸置疑的是,传媒业自身的话语管理,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本书尝试以“自我审查”^①为切入口,试图深入媒介内部,从新闻生产主体(媒介组织和从业者)的角度,研究从业者如何在回应、平衡外界对媒介话语权的利用与争夺中,进行日常的新闻生产。这个过程既有妥协,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从研究层面来讲,自我审查是一个中观选题,它上接宏大的社会理论,下抵新闻实践的点点滴滴,牵连甚广。本书在不忽视外在控制对自我审查的根本性影响之前提下,采用深度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① “自我审查”是个技术性词汇,本身并不蕴含褒贬之义,本书选用这一词汇,既是遵循国际传播学学界的惯例,也是因其概念的严谨性。这一点,在正文中有详细提及。

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情景中,本书界定了自我审查的概念;廓清了它与外在控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了自我审查在新闻生产中的存在现象、特点;初步探索了它在新闻生产中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客观分析了其影响,也实事求是地对自我审查现象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认为,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境中,我们不能简单地给自我审查贴上“好”或“不好”简单二元化的标签。从本质上来说,自我审查是媒介组织与新闻从业者对外在控制的内化,是编辑部^①内部对新闻话语的一种管理机制,从根本上应当划归为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室(newsroom)的社会控制”。

自我审查对当下中国新闻生产的影响极其复杂。它反映了媒介组织、从业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目标,他们不断试图平衡来自各方的话语体系,既要确保新闻生产的平稳进行,又要坚守媒介话语的诉求。这个过程充满了斗争、妥协与不确定性,也在实际上形塑着中国新闻业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们不得不承认,新闻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以自我审查的视角切入,不是一项容易驾驭的研究。此外,本人才疏学浅,对中国新闻业的体察或许也不够深入、全面,因而本书难免存在纰漏之处,还期待着读者诸君的阅读与评判,真诚地欢迎诸位不吝赐教。

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对诸位学界前辈、同仁的最新研究成果多有引用和借鉴之处,在此一并致谢!

刘旻(liumin921@sohu.com)

2012年5月

① 本书中的“编辑部”即西方研究中的“newsroom”,港台学者多将其翻译为“新闻室”,用以指代新闻的生产、编辑部门。考虑到中国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用“编辑部”替代“新闻室”。因此,书中的“编辑部”不仅仅限于具体的稿件编辑部门,还包括记者部门(如要闻部、经济部等),是广义概念。

目 录

绪论	1
一、自我审查——新闻业亟待开垦的研究领域	1
二、传播者研究与自我审查研究综述	3
三、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研究背景和方法	11
第一章 自我审查:社会控制的内化	22
第一节 转型期新闻生产的社会控制	22
一、政治管理及其局限	22
二、市场控制及其矛盾	27
三、受众及新闻专业环境的控制力量不断增加	28
第二节 自我审查的定义	30
一、前提限定之说明	32
二、自我审查主体之说明	34
三、“内化”存在程度差异	34
四、模糊情况的辨析	37
第三节 自我审查的形成	40
一、内化前提:社会控制对主体的容纳性	40
二、内化的心理机制:恐惧与欲望	41
三、由外到内三个层面的转化	43
四、小结:欲望与恐惧依托下的“惯习”化	48
第四节 自我审查与外在控制	49
一、审查与自我审查	49

二、自我审查与外在控制·····	52
第二章 自我审查在报纸新闻生产中的呈现 ·····	55
第一节 中国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及特点·····	55
一、一篇“豆腐块”新闻所经历自我审查·····	55
二、报纸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的特点·····	58
第二节 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常见的处理方式·····	62
一、故意遗漏·····	62
二、语言词汇策略·····	66
三、巧妙把握报道时机·····	68
四、选择曲折的表达方式·····	69
五、改变新闻重点·····	72
六、转换新闻事实·····	73
第三章 自我审查的运行机制 ·····	75
第一节 影响自我审查的因素·····	75
一、媒介定位与专业诉求·····	75
二、规避的风险类型及大小判断·····	80
三、传媒的行政级别与地域因素·····	85
四、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与记者的职业旨趣·····	86
第二节 自我审查中各因素的博弈机制——以灾难性突发事件报道 为例·····	91
一、党报：自我审查确保官方话语的传达·····	92
二、调查性报纸：自我审查安全传达民间话语·····	103
三、市民报：侧重传达官方话语，兼顾部分民间话语·····	107
四、小结：自我审查中各因素博弈与话语表达·····	109
第三节 经济因素对自我审查的影响·····	110

第四章 自我审查对报纸新闻生产的影响·····	113
第一节 自我审查从三个主要生产环节影响新闻生产·····	113
一、选题环节:围绕“时”、“事”、“利”标准“过滤”信息·····	113
二、采写环节:选择消息来源、事实进行初步建构·····	117
三、编辑环节:再次“过滤”风险与“建构”主流价值观·····	117
四、见报反馈及自我审查的向下流动·····	120
第二节 案例分析:编辑部内部的自我审查·····	121
一、重要信息变形、流失以构建“合法化”框架·····	124
二、真实信息的“偷渡”与传达·····	128
三、新闻报道的安全实现及样本意义·····	130
四、小结:编辑部自我审查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影响·····	131
第五章 自我审查:规训与抗争的博弈·····	134
第一节 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机制·····	134
一、自我审查是我国新闻编辑部内的话语管理机制·····	135
二、自我审查体现出新闻“把关”的积极意义·····	137
三、自我审查增加了报道可能性、拓展了新闻实践的边界·····	137
第二节 警惕自我审查的消极面·····	138
一、自我审查“过滤”敏感信息,导致信息流量不平衡·····	139
二、自我审查建构“合法化框架”,削弱信息矛盾张力·····	140
三、自我审查加剧了部分记者的“犬儒主义”·····	141
第三节 拓展新闻生产的弹性空间·····	142
一、保持清醒,防止自我审查“惯习”化为新闻常规·····	143
二、“把关上移”,将自我审查留在编辑部内·····	143
三、完善薪酬补偿体系,弥补记者的经济损失·····	144
四、巧妙利用情势,借力化解风险·····	145

五、发展行业支援,鼓励“民间奖励”.....	145
结语.....	147
参考文献.....	149
后记.....	162

绪 论

新闻业自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新闻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塑造了新闻?这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美国学者 C. MacDougall 这样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成千上万的事件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所有发生的事件都是潜在的新闻,直到新闻供应商赋予它们以解释,它们才成其为新闻。换句话说,新闻是对事件的解释,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的什么东西。”^①这句话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闻与客观事实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15年后,即1978年,学者盖伊·塔奇曼揭示的新闻的本质——“新闻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②,真可谓一语中的。

一、自我审查——新闻业亟待开垦的研究领域

正是因为新闻的这种“建构”功能,媒介的报道“并非只是透明地报道本身就‘自然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因此,自新闻业诞生之日起,新闻话语就天然地与各种权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新闻生产亦始终处于各种权力与利益的控制与博弈之中。

这种控制与博弈早已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着墨最多的莫过于各种权力对于新闻业的控制与步步紧逼,深陷其中的新闻业似乎总是给人以被动无力的印象。而实际上,新闻业本身也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媒介组织及其从业者也从未真正“缴械投降”过。在新闻业内部,新闻生产主体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一场控制与反控制、规训与抗争的博弈。

新闻从业者如何回应这种博弈?坐等束手就擒显然不是它的选择,那么,他们如何做到在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中,既将媒介自身

^① MacDougall C, *Interpretative report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12.

^② [美]盖伊·塔奇曼著,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做新闻》,华夏出版社,2008年。

面临的危险降至最低、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规训，又始终坚守住自身的职业追求与价值呢？

这正涉及新闻业内部的自我控制，即媒介组织及其从业者的自我审查。

在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一直是各国新闻生产挥之不去、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前也在国际新闻界蔓延。在中国语境中，经过 30 多年改革发展，新闻媒介经历了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①、“没有民主的自由化”以及“没有自主性的专业化”^②的过程，媒介的环境自成一体，新闻业界的自我审查更加复杂、微妙。媒介及从业者的研究都表明，尤其是 2003 年以后，随着政府外在管制逐渐加紧，中国传媒的自我审查趋势也愈演愈烈。

这是中国新闻业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对此国内学界却没有给予重视。一提及国内新闻生产的现状，就一味地将矛头指向政府对媒介的直接控制上，反而忽视了这一控制的微妙变化和实现的特殊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管理法制化程度提高，在日常的新闻生产中，很多外在控制必须转化为新闻业界的内在控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新闻生产的了解过于表面、大而化之，误以为市场化、政治控制可以解释一切，只看到了外在的管理控制，却忽视媒介内部的自我控制；只见控制不见积极争取，只看到了媒介组织和从业者迫于压力在外在规训面前低头，却没有真正深入新闻业内部，从新闻生产主体不能言说的实践与抗争中，去了解他们在服从规训的同时，如何通过自我调控，亦在不断地积极争取与突破边缘，进而一点点推进着中国新闻生产的进步。

自我审查正是这么一个关乎新闻业界生产内幕的东西，它是开启中国新闻生产的一把钥匙。自我审查实际上反映了主体与客体、规训者与被规训者之间的一种内在博弈机制，揭示了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情境中，新闻从业者如何在服从规训与抗争规训之间进行艰难的博弈。

① Chan 认为不同于世界上诸多地区发生了传媒商业化过程，当代中国的传媒市场化是在所有制不发生转变以及政府仍然强有力地施加着约束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国家仍然是传媒的所有者，与此同时，政府对传媒仍然实行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因而被学者们称为“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1993）。

② Zhao Y Z,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具体而言,即在外在控制面前,新闻从业者何时进,何时退?何时听从指令,何时临场发挥?一时的退让意味着什么?一时的推进又能带来什么?中国的新闻生产就是在这种进进退退之中渐进式地发展,在抗争中退让,在退让中前进,呈现出一个渐进的,同时又有些循环的过程。

因此,在中国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是一个关系复杂、影响重大的问题,它首先直接关系到具体的某一次新闻报道。在现实的新闻生产中,从业者在规训面前的“退”与“进”直接反映在新闻报道之中。大体而言,业界的自我审查是围绕着安全传达进行的特殊的信息处理,其处理因时因势因人而异,呈现出一个连续性的变化幅度。一般而言,这种处理是以信息的某种变形(尤其是敏感的、负面的新闻)为前提来实现安全的新闻表达。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自我审查更是直接关系中国新闻生产的大局。因为基于自我审查变动不居的模糊特性,在外界规训与内部抗争的博弈之中,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角力之下,自我审查实际上为中国的新闻生产开辟了一个弹性空间。传媒常常就此“临场发挥”,借助自我审查力图突破但又适可而止,实现某种妥协与平衡,在某种程度上试探着报道底线、调整着实践范围。

可以这么说,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新闻生产,必须了解从业者的自我审查,了解从业者与权力博弈的过程。它一方面能够回答中国新闻生产为何呈现如此现状的这一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新闻业的行为主体——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作为和心理状态,而这些对于中国的信息传播、新闻自由、新闻生产本身而言,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研究自我审查对于研究中国新闻生产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传播者研究与自我审查研究综述

自我审查(self-censor 或 self-censorship)研究涉及传播者研究、新闻生产的控制研究、控制机制中的自我审查研究三个方面。围绕自我审查研究,控制研究将融合于传播者研究之中。

1. 传播者研究

作为新闻的采集者、制作者,传播者是新闻生产中的关键环节,其意识形态、观念、职业意识、自我认知等深刻影响着新闻的采集与制作。

1950年怀特的“把关人”研究是传播者研究的起点^①，1969年斯尼德(Snyder)对“把关人”做了回访。这些研究注重了新闻选择发生语境，即内外部资源、工作环境、竞争对手、职业理念和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的研究。

“把关人”研究开启了媒介社会学^②的研究视角。20世纪50年代研究视野逐渐被打开，从个体研究扩展到对编辑部的考察，出现了一批真正从媒介社会学角度研究编辑部的新闻生产的重要成果。其中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的研究堪称代表。布里德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双重制约，既要服从专业规则，受专业协会的制约，又要作为组织的一员受到组织的制约。他同时提出了新闻编辑室内从业者的“社会化过程”。此外，吉伯(Gieber W.)也看到了新闻室内的作业环境及人际关系对“把关”的影响，并认为个人的主观性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20世纪70年代，传播者研究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杰里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研究了专业记者生产新闻的过程，发现记者的角色行为不仅受到同事所形成的“参照群体”的影响，更受到媒介文化、记者贡献及其扮演角色的影响。他提出了要根据新闻实践的差异具体分析记者的主动性或受到的控制。

70年代的其他经典研究则多视新闻为一种社会知识，考察其生产过程如何进行，这些研究中也蕴含着对传播者认知的真知灼见。1978年，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发现了隐藏于新闻产制流程中的“新闻网”，指出新闻是对真实的社会建构。1979年，社会学家Herbrt J. Gans出版了*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从新闻价值观的角度研究编辑部，指出“新闻对真实的判断中总包含着价值观”^③。

80年代至90年代，传播者研究更加细致具体，聚焦对象更进一步从编

① 森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斯·韦伯，“从社会身份来看，他将新闻记者等同于某种政治人物”，因此，新闻记者的政治自传式传记，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针对新闻传播者的研究。中国学者黄旦(2005年)也认为早期的从业者调查，如1937年若斯坦(Rosten L C)对华盛顿记者的调查可归类于传播者研究，因此具体的传播者研究的时间应该向前推进。

② 媒介社会学，又称新闻生产社会学。

③ Herb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1979, pp. 39-53.

辑部层面往上扩展,并最终涵盖了媒介组织、媒介之外的社会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媒介影响机制研究的所有层面,不仅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更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四个传统。

1980年,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出版了《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看到了新闻从业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及其在媒介组织中受到的压力。1989年,学者 Stocking S. H. 与 Gross P. H. 在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cognitive bias in news making* 一书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将人类的信息处理成果^①融入新闻传播中,试图对记者在选择题材、判断资讯及整合信息等工作上的思考机制及其结果提出解释,并证实记者会以既有的基模去判断新的信息。同一年,Donohue Olien 与 Tichenor 的研究看到了不同层次的阅听人、市场、广告以及社区组织对新闻处理的影响。

进入90年代,1993年芭比·霍利泽(Barbie Zelizer)发表《新闻从业者作为阐释的社区》(*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以话语分析的方式来研究新闻生产,从历史话语的角度来看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构建自己的专业、职业”^②。1994年吉特林出版《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 prime time*),其中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变化进行了研究。同年,美国学者 McManus J. H. 在《市场驱动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一书中,对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传播者研究借鉴了更多其他学科^③的视野,越发深入细致、多样化,由传统媒体逐渐扩展到新媒体,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编辑部管理的影响,如网络媒体及传媒集团之间的研究等,基本上是前人研究的细致化与补充,本书不予详述。

以上是西方传播者研究的经典代表。

与国外丰硕成果相比,国内的研究略显零散、落后,但也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台湾地区研究发展进程领先于大陆,在传播者与消息来源、新闻工作者主动性、专家与生手的比较等研究方面,采用量化与质化研究结合的方

① 认知心理学中分类、假设产生、假设验证及资讯整合等心智的成果。

② 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事业》,见《文化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 如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

法,取得了很多成果。

罗文辉、藏国仁等人通过研究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指出,“如果新闻机构的工作常规(routines)以及新闻价值体系无法改变,我们将很难期待新闻记者会改变他们选择消息来源的习惯与标准”^①。郑瑞城则看到,媒介组织的内部控制主要通过强制(指责或威胁开除)、酬庸(口头或物质报酬)与规范(以理服人)三种形式形成。1996年至1997年罗文辉联合多名学者进行了大陆、港澳与台湾地区新闻工作者大调查,详细考察、比较分析了内地、港澳与台湾地区新闻人员的差异。

台湾学者林淳华与张文强考察了新闻组织内部的权力运作与新闻工作的自主权问题,并看到了媒介组织内部权力流动的多样、复杂、细腻,指出媒体所有权、科层制度、工作流程、中国社会的人情网络等因素,同样渗入和包围着新闻工作,交互、持续地成为一种工作上的限制。还有许多学者如钟蔚文等通过专家与生手的比较,开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者。

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20世纪初才真正起步,有分量的研究多来自海外华人学者,如潘忠党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对大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中国传媒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在这三股力量的相互推拉之下,专业主义在中国当前的话语实践中只能是碎片式和局域化地呈现^②。

此外,复旦大学的学者陆晔、黄旦、张志安等人的研究在论述社会转型过程中,除了聚焦新闻生产“有形的控制空间”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等之外,也逐渐开始关注一些微妙现象——组织内部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范 and 标准对新人的渗透和影响。

2. 国内外自我审查研究概述

自我审查一直是困扰世界新闻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由于它蕴含负面

① 罗文辉:《新闻记者选择消息来源的偏向》,载台北《新闻学研究》,1994年,第50期。

② 笔者认为,尽管很零碎,但是专业主义理念已经并继续成为新闻改革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据此,笔者怀疑新闻从业者已不再内化宣传体制下的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使宣传体制面临根本的危机。

意义——香港新闻工作者协会认为自我审查具有“隐秘的、欺诈的、不体面的……容易遗忘的、无意识的”特点，以及其内在性(elusive)本质，使得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难以寻迹，限制了相关研究。近15年^①以来，随着自我审查在新闻媒体圈中蔓延得越来越严重，相关研究逐渐升温，其中尤以香港学者的研究为代表^②，2009年以后，内地学者张志安也开始研究大陆语境中的自我审查。

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研究呈现两个明显分野：

其一，传播学者(如 Herbrt Gans、李金铨、李立峯^③、苏铨机^④等)注重描述现象、分析特性，通过问卷调查寻找自我审查存在的证据，并力图准确定义这一现象。

其二，欧美一小部分法律学者，如 Robert Post、Frederick Schauer 与 Stephen Alan Childress 则从法理层面出发，否认自我审查概念的真实性，大体上将自我审查看成是审查的一部分。

Frederick Schauer 认为真空中不会存在自我审查，自我审查与审查压力来源一致，即新闻工作者受制于法律、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

Steven Alan Childress 则从二者的实际运行机制，即对惩罚的避免过程进行分析。首先从审查机制发挥效用的实质看，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审查都包括两个部分或称步骤，即通过法律授权^⑤和其后对它的遵守来实现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当人们惧怕制裁而顺从时，审查才算实现。审查在日常情形中的作用方式，是法律的威慑，而非惩罚，惩罚只是威慑失败之后的措施，一般情况下，惩罚不是审查作用于普通人的方式。而这也正是自我审查的发生机制——施加足以让自己恐惧的惩罚让自身沉默，也就是说二者的作用在本质上一致——避免制裁而做出的选择。因此，Steven 认为二者不仅本质上没有区别——自我审查本质上是审查的一种形式和变种，是审查的一

① 这个时间界限是笔者依据以 self-censorship 为关键词，从英文学术论文的检索结果中得出的。

②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处于社会转型中，媒体的自我审查呈上升趋势，引起本土学者对香港新闻自由前途的关注，并将自我审查视作衡量香港新闻自由的一个指标。

③ 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

④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⑤ 比如说法定的禁止，普通法规则，强制令或许可制度。

种含蓄、固有的形式，而且认为就连自我审查这个概念的存在都会妨碍法律保护言论自由。

当然，法律专家的意见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从新闻专业出发，本书还是将着重论述传播学界的研究成果。

自我审查研究中，绝大部分是对其在世界各国新闻实践中日益蔓延、渗透的现象描述，如其中杂糅着部分原因分析。

美国学者 John Thompson、英国学者 Eric Barendt 分别研究了里根政府的信息控制手段、法律诉讼导致的自我审查。从 1999 年开始至今，剑桥大学的 *Nieman Reports* 杂志陆续发表了系列文章，指出在香港地区和爱尔兰、哥伦比亚、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家，当记者或传媒组织碰到困难、危险时，就会采取自我审查，而这正在威胁着记者职业及媒介未来的发展。

华人学者 Jiafei Yin 认为亚洲新闻界普遍存在着自我审查，这更是中国以及韩国、泰国新闻业中存在的主要现象。

回归后香港媒体的自我审查现象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学者，如 Lee C. C. 以及 Lee F. L. 等认为，回归后自我审查成为香港传媒独立和自由的制约，尽管对权力机构的批评性报道并未消失，但越来越多的报纸在涉及内地的报道中语气和态度正日益变得温和，此外，香港报业留给政见异议者的发言空间日渐缩小。

对比东西方的自我审查，其实践差异很大。在拉美，自我审查带着血与火的底色，媒介的压力来源主要是军事组织、犯罪组织、经济巨头的威胁，记者时有生命危险。而亚洲则主要是要协调媒体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的关系，外在表现似乎温和很多。

美国和香港学者还做了问卷调查。美国问卷调查^①显示了自我审查与记者年龄、报道领域、新闻分类的相关性及上司压力对自我审查的重要影响，并以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商业利益对编辑判断的侵蚀。香港的统计调查^②，从新闻工作者、读者两个角度，结合新闻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测量并证实了自我审查的存在及逐年增长的趋势。

①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与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在 2000 年对 287 名新闻从业者(主要是记者，也包括 81 名高级编辑和执行官)进行了问卷调查。

② 香港中文大学曾于 1996 年、2001 年、2006 年进行过三次针对香港新闻工作者的问卷调查。